

歷史與空間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錢華

豆棚閒話

■趙柴斤

晚清上海——一個城市的歷史記憶

2010年的上海舉辦了世博。早在一百年前，晚清小說家陸士諤就在他的幻想小說《新中國》中，虛構了一百年後的今天在上海浦東舉辦萬國博覽會的情景。

上海對於外國文化的接受從晚清就已開始。新舊、中西、傳統與現代、本地及外來各種力量在這裡相遇、衝突和並融。晚清上海城市的歷史如何解讀與重構？如何敘述？中國文化中心新通識課程「中國歷史與文化名城」(GE1107)上學期舉辦了首次嘉賓講座「晚清上海」，特別邀請了著名歷史學家、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梁文道主講。講座由高級導師林學忠博士主持，該講座還吸引了其他院系的許多師生前來旁聽。梁教授以晚清時期中國近代城市的轉型作為討論的切入點，探討晚清上海城市文化特色，為我們尋找上海的歷史記憶。

梁教授研究領域非常寬廣，包括中國近現代史、儒學史、中國基督教史、海外華人史等，他在各領域都有豐碩的研究成果，著有《The Shanghai Taotai: Linkage Man in a Changing Society, 1843-90》(中文譯著：《上海道台研究：轉變中社會之連繫人物》)、《基督教與中國》、《新加坡華人社會史論》、《宣尼浮海到南洲》等書。

他對上海的研究興趣始於三十年前香港中文大學唸研究院的時候。他花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閱讀完《萬國公報》，碩士研究的成果成為他的第一本學術著作《林樂知在華事業與〈萬國公報〉》。七十年代梁教授在美國加州大學的博士論文選擇了《上海道台研究：轉變中社會之連繫人物》作為題目，開始對上海進入深入的研究。他最新的著作《晚清上海：一個城市的歷史記憶》是他近幾年研究累積的成果。該書以清末民初的上海為重心，考察近代中國城市在走向現代的歷史行程中所產生的急劇變化和所需要面對的嚴峻挑戰。

城市的發展最先表現在城市形態方面。城市形態賦予歷史的內涵，並且和城市景觀都具有可讀性。上海開埠不久形成了兩個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和中國地方政府(華界)分割管理的局面。梁教授首先為同學們展示

了一幅清晰的上海三合一的城市地圖。上海本來是沒有城牆的，為了防禦倭寇的侵擾才修建的。開埠以後，舊城的城牆阻礙了日常往來的需要，就不斷地掀起拆牆運動。1905年地方紳士三十餘人向上海道提出拆牆。可上海道不敢決斷，引出了一場全民大辯論，形成了拆牆、不拆牆和中立的三派。其中上海灘著名的姚氏兄弟姚文楠和姚文棟就意見不一，結果反對派勝利了。到了民國1914年，具有三百六十一年歷史社會的象徵的城牆一夜之間被拆完。從此，上海舊城內華界與租界聯成一片，近代上海城市新格局定型。通過這樣識別城市地理空間的變化，同學們能夠了解城市環境意象以及城市社會如何組織和運作。

1843年上海作為條約口岸城市開放，第一次移民高潮出現在1840年代，當時有好幾萬的廣東人和香港人北上。為什麼廣東幫會與起移民大潮？梁教授從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連繫角度分析了背後的原因。上海開埠後其經濟從江南水鄉經濟轉型到遠洋海船經濟，對外貿易興起，對內貿易維持。1865年以後，特別是由於江南製造局和其他現代化企業的建立，需要大量的技術工人。現代化大企業的發展以及以家族或同鄉關係為紐帶的大量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進程以及上海市民社會和商業社會的形成。

除了船堅砲利，上海城市的近代化進程還表現在大學和學院的建設、文化出版和書店的繁榮、電影與劇團的興盛以及藝廊的興起。梁教授特別介紹了著名的《點石齋畫報》、《良友畫報》和《申報》等。今天上海的華東政法大學校址為赫赫有名的聖約翰大學所在地。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前主任魯平就是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上海之後還出現過諸如新創辦的滬江大學、東吳法學院，及天主教創辦的震旦大學等教會大學。原

香港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楊鐵樑畢業於東吳大學。梁教授總是能把上海的歷史和香港的人和事聯繫起來，讓學生體會到滬港歷史的互動。上海的歷史，當然很大程度是由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創造出來的。梁教授選擇了三種類型的上海人，較為詳細地考察他們處理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兩個「視野」的態度。三種類型的上海人包括：一部分成功的企業商人；管理上海的上層官吏；別具一格的非普通文人的「狂士」。梁教授稱他們為「雙視野人」，各用不同的態度和方法處理「新舊」、「中西」之間的問題和關係。

在講課的最後，梁教授與同學們就他們關心的話題進行廣泛的交流。他淵博的學識、平易近人的態度和幽默風趣的演講，給同學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同學們在本次座談會之中收穫頗多，希望能夠有機會和梁教授有更多更深入的交流。

1970年代國內外研究上海史的學者並不多，梁教授形容自己當時頗有孤軍奮戰的感覺，而如今，上海研究已成為全球關注的一個學術熱點。與上海如此有學術之緣的梁教授，也有意想不到的憾事。因為公務總是繁忙，臨近世博閉幕前一個月他才決定前往參觀。不巧的是當天香港颶風，他不得不痛心取巧了航機。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上海的一座老城門。

網上圖片

古代春節的「致富秘籍」

「除夕日取富家田中土泥灶，招財，勿令人知，可致富。」張宗法《三農紀》裡說的跟《枕中書》、《如意方》講的如出一轍：「立春日取富家土塗灶，令人得富。」這說明春節在古人心中不僅僅意味着歡樂，也是致富發財的好日子。

《如意方》、《枕中書》、《靈寶方》、《淮南子術》以及古典小說《錄異傳》等都可稱得上是古代的「致富秘籍」，跟今天市場兜售的許多《勵志大書》差不多。不同的是，古人說得非常直白，明眼人一看都知道，所謂的「致富秘方」就是赤裸裸的巫術；與古人相比，現代人就高明得多，巧妙地將「巫術」包裝成「事實」後，可信度雖然大大地提高了，但複製的成功率幾乎是零，因為人是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的。這是閒話。我想說的是，古人跟現代人一樣，都是非常渴望發家致富和成為一名成功人士的。並且，古人想「致富」和「成功」還特別注重一個黃道吉日。

翻過古代「致富秘籍」的人都曉得，古代較為常見的致富術多從交感原理出發，除了講究選日子，還包括埋靈物、塗靈土、用符咒等諸法。《枕中書》謂：「元旦(即現在的大年初一)向晨，至門前呼牛馬雜音令來，仍置粟豆於灰，散之宅內，云可以招牛馬；燒牛馬骨於庭中，大貴大富。」書中還說，除夕之夜，用石灰在谷場、道路或居室內畫個米囤，就能祈求來年的五穀豐登。在這些古代的「致富秘籍」中，可以發現古人的致富術都特別注重具體日子的威力，而除夕和大年初一又是一年中最發財致富的最佳日子。由古代巫術派生出來的一種功效更大的致富「如願術」記載得更加詳細。

《如意方》裡說，南北朝時期，人們習慣在元旦(大年初一)之日，將穿線的繩子繫在木杖的一頭，手持木杖繞地走幾圈，然後把木杖投在垃圾堆上，認為如此即可令人如願。而古代的「如願術」寫得則有鼻子有眼。書中說，廬陵商人區明有一年除夕經過彭澤湖被自稱「青洪君」的神仙請去做客，臨別時區明有何需求。區明按照「致富秘籍」回答：只要「如願」一物。神仙便將一名叫「如願」的女婢送給他。區明得到如願，有求必應，「數年逐大富」。此後區明「意漸驕盈，不復愛如願」。



有個大年初一的早晨，如願起床晚了些，區明即手持木杖打來，慌亂之下，如願「以頭鑽入糞(垃圾)中」，從此再也不肯露面，區明立即就淪為貧民……這個故事雖然沒有對發財「如願術」的淵源作詳細解釋，但足以說明選擇「春節」期間做發財致富夢的活動在當時已經廣泛流行。

用木杖打垃圾，原本是起驅邪降魔保平安作用的。隨著「如意術」的走紅，春節用木杖打垃圾能發家致富也就越傳越邪乎，可謂風靡神州大地。據史載，直到宋朝末年，蘇州民間仍完整地保留着大年初一或除夕之夜杖擊垃圾祈求發家致富或成功願望的風俗。

古代的那些「致富秘籍」都是巫術，這是毋庸置疑的。不過，如果把《枕中書》、《如意方》、《錄異傳》等當文學藝術作品看就會發現，藝術創作不存在什麼標準答案，也最忌模式化。我們如果對自己知識範圍以外的、一時還不能認識其價值的事物或者意見、主張等，因與我們既有的見解或者經驗相悖，就視之為異端，一概加以排斥，那就很可能窒息我們的想像和創造。就像古代那些「致富秘籍」，傳授的「速富經」雖然是天方夜譚，但它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傳統的民俗文化和古人對春節的期待與重視。這樣來描寫春節、展示春節的重要性，難道就比現代人寫得差嗎？

文化觀察

■文：馮磊

獨瓣蒜

羅貫中的歷史小說《三國演義》中，有一回是「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白衣渡江」。寫的，是華佗為關羽刮骨療傷的故事。這個故事，在民間可以說是家喻戶曉。文中寫道，眾將「只得四方訪問名醫。忽一日，有人從江東駕小舟而來……自言姓名：『乃沛國譙郡人，姓華，名佗，字元化。因聞將軍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來醫治。』」

華佗為關公刮骨，寫得非常傳神：「佗乃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聲。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公飲酒食肉，談笑弈棋，全無痛苦之色。」這段文字，把關羽的英雄氣概和華佗的神醫術寫得淋漓盡致。

但，據人考證，為關羽療傷的其實並非華佗。有資料稱，關羽受傷，是在與曹仁的戰鬥中。這一年是建安二十四年，即公元219年。華佗生於145年，只活到63歲，這樣推算起來華佗死於建安十三年(208年)。關羽中箭的時候，華佗已經死去多年，兩個人怎麼可能有交往呢？

與此類似的，中學語文課本裡有一篇《扁鵲見蔡桓公》。文章寫道，蔡桓公諱疾忌醫，不相信醫生的忠告，不久就死了。但，歷史上並沒有蔡桓公這個人。《韓非子》裡的蔡桓公，不知道是不是蔡桓侯。而這個蔡桓侯，公元前695年就死了。比秦越人早了接近300年。——這二位，也沒有機會一起坐下來喝杯酒。

文學不是史學，《三國演義》是一部歷史小說，自然不能看作歷史的真實。關羽刮骨療毒的事情或許真有其事，《三國誌》裡就有記載。但，陳壽並沒有大刺刺地將治病的醫生寫成是華佗。

文學家喜歡杜撰，就像葛朗台喜歡跑到密室裡數錢一樣。葛朗台數錢，數到心花怒放。文學家寫小說，杜撰的段子越花哨越熱鬧。

英國小說家威爾遜寫了一部小說，叫做《維尼與沃爾弗》。沃爾弗，就是阿道夫·希特勒，路人皆知的法西斯、大獨裁者。維尼，是音樂大師瓦

格納的兒媳婦。這兩個人，本來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但，小說家把他們安排到了一起，讓兩個人上了床。

小說不是歷史，小說需要的，或許是性史。在小說裡，希特勒只要和女人上床，馬上就臭屁連連。這個細節，讓無數的讀者會心一笑。久而久之，《維尼與沃爾弗》竟然熱銷起來，一時風靡英美。這件事，讓我感覺頗為有趣。獨裁者也罷，民主體制裡的政治家也罷，在台上或許有「鐵腕」之稱，幾乎無所不能。但，最終往往往免不了要成為他人筆下或口頭的笑料。希特勒地下有知，不知道會不會被氣得三屍神暴跳。

關於希特勒，民間的傳說(姑且稱之為民間文學吧)也不少。這些話，主要圍繞阿道夫的下半身來展開。比如：希特勒是一個令人恐怖的同性戀；他曾經睡過自己的親侄女；希特勒只有一個舉丸……這些話，越傳越離譜。大家口頭的阿道夫，不僅是一個色情狂，而且是一個殘障人士了。

關於希特勒的這些傳說，據說讓不少人士操碎了心。有人稱小羊希特勒不學無術，有一次試圖往山羊嘴裡小便，所以痛失了「一瓣蒜」。有人為此去查閱了希特勒早期的檔案，發現希特勒的體檢記錄一切正常。不過，也有兩位歷史學家合力考證，稱希特勒在索姆河戰役中被打壞了一隻舉丸……

曾經在莫言的一篇小說裡，讀到過一個「獨瓣蒜」的故事。文中講一個孩子，放鞭炮炸壞了一隻舉丸，成了獨瓣蒜。成年以後，卻更勇猛……莫言用山東俗語寫道，「獨瓣蒜更辣」。

民間所謂獨瓣蒜，指的是一隻蒜頭上只有一瓣蒜。這樣的蒜，實際口感要辣很多。

山東農村，用蒜泥搗雞蛋是一道好菜。為了更辣一些，有經驗的人往往選取獨瓣蒜和熟雞蛋一起搗了來吃。希特勒癡狂屠殺猶太人，乃標準的面惡心黑之人，莫非真的是「獨瓣蒜」嗎？

中國高校需要「復旦憲章」

■文：王曉華

2010年的最後一天，我讀到了一篇振奮人心的報章：《復旦大學制定「復旦憲章」限制校長權力》(《東方早報》2010年12月31日)。這是我在2010年讀到的有關高校改革的最「給力」的文章之一。

據該文報道，在「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楊玉良院士的主導下，復旦大學正在制定《復旦大學章程》。《憲章》的形式限制校長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權力。「憲章」除了明確要求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分離外，還規定校學術委員會和指導委員會具有獨立於行政權力的決策權，甚至可以「召見校領導，進行問詢，甚至是問責」。

如果「復旦憲章」可以實施並推廣的話，那麼，中國高校所患的行政病將得到救治，學術和教育將至少部分地擁有獨立的靈魂。我這樣說話並非僅僅是受了楊玉良院士理想主義情懷的感染，更是源於一個學者和教師對《復旦憲章》的認可。

長期以來，中國大學實行的是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從院系到校，「一把手」都牢牢地掌控着人事權、財務權、學術權。從人員的聘用到經費的分配、學科建設、課程設置，所有重大事務都由「一把手」說了算。大的「一把手」決定小的「一把手」的浮沉之路，小的「一把手」則決定所有無權無勢者的命運。通過層層

分封，中國高校形成了一套嚴格的等級制體系，建造了一座座權力金字塔。可以說，引導大多數中國高校的並不是「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而是主奴二分法。在這個等級制體系中，沒有權力的學者、教授、管理人員處於底層，非但不能真實地參與決策，而且無從發出自己的聲音。為了生存下去，他們只能唯權力的馬首是瞻，變得唯唯諾諾、渾身媚氣、心境灰暗。部分人於心灰意冷之餘不再忠於教育事業，走上了「白天是教授，晚上是叫獸」的沉淪之路。無魂的學者和教師自然無法創造有魂的學術和教育。教育失魂和學術失魂現象越來越普遍化，中國高等教育和學術則日益為國人所詬病。

面對中國高校的諸多病症，人們曾開出過各類藥方。其中，單純強調道德主義的藥方不但顯得空洞，而且凸顯了對無權無勢者的暴力態度：在金字塔式的等級制結構中，在「一把手」全面掌控「群眾」命運的體系裡，要求無權無勢者保持「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無異於將他們置於兩難境地，其結果只能是製造各類冷笑話。解鈴還須繫鈴人，體制之病必須在體制的層面上治療。既然中國高校之病源於集權體系，那麼，不建立分權的體制就無法消除其病根。沒有具體的分權體制，「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政教網無羈絆」不是永遠的追憶，

心頭書要多

■文：青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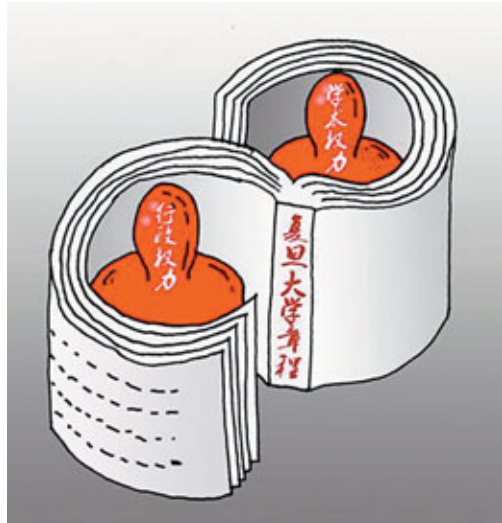
曾看過一篇文章，作者自述有一次想要查找一份資料，然在家中的數千本藏書前，卻茫然無頭緒，不知該從哪裡查起，因為根本不記得是出自哪一本書了，於是發出「書到用時方恨多」的感歎。

該文章的主旨，或許意在自矜藏書之富，但這種「書多成恨」的情形卻頗值得一說。陶淵明詩云：「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意為讀書是人獲取知識的唯一途徑。至於讀書又分為涉獵博覽，以開拓知識面為目的的泛讀，以及潛心修學的深讀。但不管哪一種讀法，要想有效獲取資料，動記和動查都必不可少。畢竟人的記憶力有限，面對浩瀚書海，難免會有所遺漏，所以讀書時，應把書中的有用部分抄錄到小冊子裡，或者記載到專門的卡片上，然後分門別類，以便於日後翻閱檢用。

另在讀書時，若是一時心會，有所觸動或

感悟，也應當及時的記錄下來。因為這種片刻之間的思維火花，如同白駒過隙，稍縱即逝，過後再想完整的回憶復原，是很難做到的事情。蘇軾詩云：「作詩火急迫近進，清景一失後難尋。」講述的就是這個道理。作詩時描摹物象，那種瞬間捕捉到的靈感，就如浮光掠影，過了以後很難再找回來，所以一定要趕緊記錄，就像追捕逃犯一樣，片刻也不容耽擱。

明人吳應旻的《讀書止觀錄》載：「晏元獻公平居書簡及公文牘，未嘗費一紙，皆積以待書，雖封皮亦十百為沓。暇時，自持熨斗，貯火，如傍灸香匙視之，以鐵界尺鎮案上。每讀書得一事，則書一封皮，後批門類，授史傳錄。」北宋宰相晏殊，平時不論收到公文書札還是朋友家人的信函，看過之後都會積存在一起，即使書信的封皮也是如此。等到封皮積存了一定的數量，閒空下



就是永遠的理想。分權的實質是弱化權力而強化權利，讓普通個體由服從者、匍匐者、無力者站立成為權利主體。只有當普通教師能夠以權利主體的身份與各級行政權力對話和博弈時，他們才能重新學會直立行走，才能有尊嚴地活着，中國大學和中國學術才能有靈魂可言。從這個角度看，復旦大學以章程的形式限制校長等各級一把手的權力，要求「依法治校，民主決策」，凸顯學術權利對行政權力的制約作用，無疑走對了方向。

中國高校需要「復旦憲章」，需要實現「復旦憲章」所代表的分權、自治、制約精神。作為一個學者和教師，我祝2011的中國出現更多的「復旦憲章」，祝更多的「復旦憲章」由理想變為現實。(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他就拿一個熨斗，把封皮拆開熨平，用鐵界尺壓在書桌上。每次讀書有了心得，就取一張舊封皮記述，過後再分成若干類別，讓手下的書吏抄錄到專門的冊子上，以備日後翻檢徵引。

除了動記，還要動查。蘇軾任杭州太守期間，秦觀的弟弟秦觀曾從之為學，他對蘇軾動查不懈的嚴謹學風乃是深有體會，「其每有賦詠及著撰，所用故實，雖目前爛熟事，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蘇軾寫作時援用的材料，哪怕是熱熟的典故，事前都會讓秦觀或兒子蘇過查閱一遍，確定以後才下筆。這樣做的目的，一是保持寫作態度的嚴謹；二是借此加深印象，融會貫通，為日後寫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古語云：「案頭書要少，心頭書要多。」讀書動記動查，使書中的精華部分爛熟於心，運用起來游刃有餘，案頭所需的書自然也就少。這是一個不斷累積的過程。如果只是案頭書多，心頭書少，難免就會有「書多成恨」的喟歎。